



郭沫若

黄侯兴 著

人民出版社



国丛书



祖国丛书

郭沫若

黄侯兴著

人民出版社

封面木刻像：陈 新作

封底木刻：曾景初作

封环设计：郭振华

郭沫若

GUO MORUO

黄侯兴著

人民出版社出版

北京东光印刷厂印刷

北京朝阳门内大街166号

新华书店发行

787×1092毫米32开本

6印张

114,000字

1986年3月第1版

1986年3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印数 0,001—8,000

书号 11001·772

定价 0.83元

目 录

少年时代(1892—1913)	(1)
——反封建意识的萌发	
留日十年(1914—1923)	(18)
——爱国者的一颗赤子之心	
戎马书生(1924—1927)	(50)
——在斗争中走向自由的 王国	
亡命日本(1928—1937)	(79)
——海外十年的战斗生活	
归国请缨(1937—1945)	(101)
——欣将残骨埋诸夏	
天地玄黄(1945—1949)	(147)
——八千里路赴云旗	
新的里程(1949—1978)	(165)
——为新中国战斗到生命 最后一息	

少年时代(1892—1913)

——反封建意识的萌发

四川省乐山县观峨乡沙湾镇，背靠秀冠神州的峨眉山的第二峰——绥山，面临波涛滚滚的大渡河，下傍水碧如靛的青衣江，淙淙茶溪从峨眉山余脉蜿蜒地流泻下来，穿过市镇，广阔的田野左右展开。这个气势雄伟、风景秀媚的好地方，便是郭沫若的故乡。

郭沫若，1892年11月16日（阴历九月二十七日）出生于一个地主兼营商业的家庭。他行八，出生时已死去两姐一兄，还有两姐两兄，母亲亲昵地呼之“八儿”，乳名文豹，取“豹子投胎”之意，号尚武，学名开贞，笔名之一“沫若”，是取他故乡的沫水（大渡河）和若水（雅河）两河合拢之意。

郭沫若原籍福建省汀州府宁化县，当初祖先穷得“背着两个麻布上川”，“家产是在曾祖父的一代积累起来的”，但由于子孙过多，祖父又爱散财，以致“在他的一代，家业也就很凋零”，直到“父亲手里公然又把家业恢复了起来，又能买田，买地，买房廊，买盐井了”。①

① 《我的童年》，《沫若文集》第6卷，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18页。以下《沫若文集》均系人文版。

祖父郭德明，字秀山，长年走江湖，曾与其弟执掌过沙湾码头，为人豪爽，仗义成性，闻名于铜、雅、府三河，外号“金脸大王”。父亲郭朝沛，字膏如，早年失学，在盐井上当过学徒，未及成年就当家管事。郭朝沛是一个很有手腕的精明的商人。他酿酒、榨油、卖鸦片烟、兑换银钱、聚纳五谷等等，从此家业便振兴起来。母亲杜邀贞，嘉定城东南十里的杜家场人，是一个“零落了的官家的女儿”。郭沫若后来回忆道：“在一生中，特别是在幼年时代，影响我最深的当然要算是我的母亲。我的母亲爱我，我也爱她。”^①她资质聪明，虽未进过学，但单凭耳濡目染，也认得一些字，而且能背诵一些诗词。还在郭沫若发蒙以前，母亲就教他念诗。“翩翩少年郎，骑马上学堂。先生嫌我小，肚内有文章”的诗句，曾逗引他浓厚的读书兴趣；“淡淡长江水，悠悠远客情。落花相与恨，到地亦无声”等唐诗，使他终生难忘。他说：“我们兄弟姐妹们底家庭教育全是受我母亲之赐。……假使我也算得个诗人，那这个遗传分子确也是从我母亲来的了。”^②

峨眉山在笑，大渡河在轻歌曼舞。

峨眉山，峨眉山，你的山在那一边。

郭沫若和姐姐们望着巍然的峨眉山，沐浴着浩荡的大渡河水唱起儿歌，感受到了“那山下的大渡河的流水，是滔滔不尽的诗篇”。他在这里享受了天国的快乐，度过了他美好的

① 《我的童年》，《沫若文集》第6卷，1958年版，第13页。

② 《三叶集》，上海亚东图书局1920年版，第111页。

童年生活。他对这个秀丽多姿的故乡有着深厚的感情。

郭沫若后来走上文学的道路，成为近代中国一位浪漫主义诗人，当然不尽是地理环境的原因。但是，正如他在1923年1月19日给四川草堂文学研究会诸乡友的信中所说：“吾蜀山水秀冠中夏，所产文人在文学史上亦恒占优越的位置。工部名诗多成于入蜀之后，系感受蜀山蜀水底影响……。”四川“绝好的山河”曾经给历史上许多文学家以丰富的滋养；同样，峨眉、凌云、泯江、大渡等名山大川的宏伟气魄和博大精神，对于郭沫若性格的陶冶及其浪漫主义诗人气质的形成，也有着深远的、潜移默化的影响——大自然养育了这样一位未来的东方诗人。

郭沫若出生的时候，中国在帝国主义列强瓜分下面临着空前的民族危机，社会经济正在加速殖民地化。帝国主义通过各种方式压榨中国人民的血汗，大量倾销商品，加速了中国城乡手工业的破产；对中国原料的疯狂掠夺，又刺激了中国农村某些经济作物的发展。郭沫若家从凋零、衰败到振兴、发达的过程，便是十九世纪末近代中国商业经济更加殖民地化的反映。在郭沫若记事时，家里的生活已经相当优裕。他说：“我们家里在我有记忆的时候，已经是一个中等地主，虽然土地好象并不那么多，但在偏僻的乡窝里，也好象很少有再多过我们的。”①“作为地主阶级的儿子，在这儿我没有吃过苦。农夫耕耘时常唱秧歌，我觉得好听。撑船的人和拉纤的人发出欸乃的声音，我佩服他们有力气，冬

① 《我的童年》，《沫若文集》第6卷，1958年版，第14页。

天不怕冷。牧牛童子横骑在水牛背上吹芦笛，我觉得他们好玩而水牛可怕。乡镇上逢集的时候热闹一番，闲天又冷下去。人们除坐茶馆、聊闲天外，没有人生。”^①这种无忧无虑、悠然自得的田园牧歌式的生活，使幼年的郭沫若不懂得人民的疾苦和世态的炎凉。他的幼年主要是从家庭教育和书本知识中去汲取思想营养的。

1897年春，郭沫若不满五岁，父亲就带他到“绥山山馆”受家塾教育。塾师沈焕章，四川犍为县人，是一位廪生，学识渊博，忠于职守。发蒙时读的是《三字经》，后来是读司空图的《诗品》，《唐诗三百首》，《千家诗》。再后来是读《诗经》、《书经》、《易经》、《春秋》、《古文观止》等。按照家塾的规矩，白天读经，晚上读诗。在他看来，与其读《易经》、《书经》、《周礼》、《仪礼》等经书，不如读诗有兴味。不过熟读这些古书，却使他得益匪浅，自幼打下的牢固的国学基础，对他后来在史学和文学方面都达到很深的造诣有重要影响。他后来在《如何研究诗歌与文艺》一文中说过：

幼时我自己所受的教育，完全是旧式的。读的是四书、五经，虽然并不能全懂，然而也并不是全不懂。象《诗经》那种韵语，在五经中是最容易上口的。四书也并不怎么深奥，这些古书的熟读，它的唯一的好处，便是教人能接近一些古代的文艺。

此外便是爱读比较高古的唐诗。在唐诗中，郭沫若喜欢王维、孟浩然、李白、柳宗元等诗人，而不甚喜欢杜甫，更有点

① 《序我的诗》，《沫若文集》第13卷，1961年版，第119、120页。

痛恨韩愈。王维在《竹里馆》里“全不矜持，全不费力地写出了一种极幽邃的世界”，使他深深地感受到了诗的美。他说，“这种初步的教育似乎就有几分把我定型化了”。①

在家塾里，郭沫若开始学做对句及五七言试帖诗。这对儿童来说，真是一种刑罚。“因为连说话都怕还不能说条畅的小孩子，那里会能了解什么虚实平仄，更那里能够了解什么音律对仗呢？”②郭沫若受这种“诗刑”足足有两三年，但为受“诗刑”而得到的好处便是读了许多唐诗。

在古典诗歌熏陶下，郭沫若初步具备用旧诗来状物抒情能力。五律《邨居即景》便已显露这位未来的大诗人早期的创作才华：

闲居无所事，散步宅前田。

屋角炊烟起，山腰浓雾眠。

牧童横竹笛，邨媪卖花钿。

野鸟相呼急，双双浴水边。

峨眉山“甲天下”的自然景色，山村田园的素朴风光，使少年诗人陶醉。浓厚的生活气息和天真活泼的生活情趣，洋溢在诗中。在《早起》一诗里，诗人通过描述自己在冬日早晨临窗远眺二峨山、三峨山（又名美女峰）的雪景，抒发了他的惜春的情怀。这虽是一首即兴诗，但象“无端一夜风和雪，忍使峨眉白了头”这样的诗句，却生动传神，联想奇特。这些家塾时期写下的旧诗，当然说不上有什么深邃的含义，但却表

① 《如何研究诗歌与文艺》，《沫若文集》第13卷，1961年版，第131—132页。

② 《我的童年》，《沫若文集》第6卷，1958年版，第34页。

现了郭沫若早期观察生活与概括生活的本领，说明这位诗人在少年时代所具备的创作素质，他后来诗作的浪漫主义艺术风格，在这里也已初见端倪。

历史在前进。郭沫若的少年时代，正是近代中国历史发生急速变化的时代。这是从维新变法向辛亥革命过渡的历史转换时期，是新旧思潮首次大交锋时期。虽然他的少年时代是被关闭在四川宗法社会里面，但新学与旧学之争已经波及到了古老偏陋的山村；他在沉闷、冷漠的历史氛围中，开始呼吸到一点新鲜的空气。郭沫若正是近代中国过渡时期孕育出来的一颗幼芽——他是最后一批蒙受封建传统诗文严格教育训练的学童，也是较早感受着资本主义文明的少年。

1900年庚子事变后，郭沫若家乡的家塾教育发生了较大变化。于四书、五经及唐宋诗文之外，增设了格致、地理、地质、东西洋史、修身、国文等新课，还有一部《笔算数学》。“家塾的壁上挂的四大幅合成的一面《东亚舆地全图》，红黄青绿的各种彩色使师生“观感焕然一新”，郭沫若觉得“到这时才真正地把蒙发了”。^①塾师的教授法也有所改进，注意了对学生的启发引导，例如一面教读《左氏春秋》，一面教读《东莱博议》，注意了相互之间的比较。郭沫若后来说：“这真是给予了我很大的启发。我的好议论的脾气，好做翻案文章的脾气，或者就是从这儿养成的罢。”^②

①② 《我的童年》，《沫若文集》第6卷，1958年版，第39—40页。

在郭沫若发蒙阶段，他的大哥郭开文（橙坞）也是给他影响很深的一个人。郭开文于1903年四川废科举兴学校时考入成都东文学堂，后留学日本，“反正”时回到四川。他在东文学堂读书期间，接触了新学，立即成了启蒙运动的急先锋。郭沫若后来回忆道：“成都是一省的都会，接受外来的影响自然较早；他在成都接受的影响直接传达到我们乡里来。放足会是他首先提倡的，我们家里人在乡中解放得最早，就是五十多岁的我们的母亲，那时候也把脚解放了。女子素来是不读书的，我们的妹子和侄女也都跟着沈先生读起书来。这些不消说都是他的主张。”^①此外，郭开文还把大量的新书报，如《启蒙画报》、《经国美谈》、《新小说》、《浙江潮》等，源源不断地寄到家塾里来。郭沫若那时尤其喜欢《启蒙画报》，“二十四开的书型，封面是红色中露出白色的梅花。文字异常浅显，每句之下空一字，绝对没有念不断句读的忧虑。每段记事都有插画，是一种简单的线画，我用纸摹着它画了许多下来，贴在我睡的床头墙壁上，有时候涂以各种颜色。”^②郭开文还给郭沫若灌输“富国强兵”、“实业救国”的思想，并动员他到东洋去读书。1905年春，郭沫若本想随大哥赴日留学，因父母反对未能成行，他后来也没有走上实业救国的道路。但是，他大哥那种浪漫主义的气质，那种善于接受新事物、勇于创新、积极跟上时代潮流的民主革

① 《我的童年》，《沫若文集》第6卷，1958年版，第40页。

② 《我的童年》，《沫若文集》第6卷，1958年版，第37页。

命精神，对于他的民主思想的形成与发展是有着深刻影响的。所以郭沫若后来一直怀着感激之情来纪念他的大哥，说“我到后来多少有点成就，完全是我长兄赐予我的”。^①

这里还应提及的是，郭开文收藏的几部“奇书”，如《西厢记》、《西湖佳话》、《花月痕》等，也是培植郭沫若的反叛性格、引导郭沫若走上文学道路的带有启蒙性质的文学作品。尤其是《西厢记》，更是少年郭沫若接受文学熏陶的第一部优秀的古典戏曲作品，它对郭沫若后来创作《三个叛逆的女性》等历史剧，无论在思想上或艺术上都产生了明显的影响。后来他论及元代戏曲时，首先举出《西厢记》的反封建精神，称它是“有生命的人性战胜了无生命的礼教底凯旋歌，纪念塔”。^②

1906年春，郭沫若到嘉定府的首县——乐山县高等小学读书。乐山，后周宣政二年（公元579年）名为嘉州，旧府署在城北海棠香麓，因而有“海棠香国”之称。大约是“天下之山水在蜀，蜀之山水在嘉州”^③的缘故罢，历史上多少骚人墨客在这里题壁，留下了脍炙人口的诗篇。例如北宋爱国诗人苏东坡便有题为《送张嘉州》一首七绝：

少年不愿万户侯，亦不愿识韩荆州；
但愿身为汉嘉守，载酒时作凌云游。

① 《我的学生时代》，《沫若文集》第7卷，1958年版，第9页。

② 《西厢艺术上之批判与其作者之性格》，《文艺论集》，上海光华书局1925年版，第304页。

③ 王士禛：《蜀道驿程记》。

在登临乐山凌云山(大佛寺)路旁的石壁上,还留有“苏东坡载酒时游处”的刻字。凌云山峰峦有“东坡楼”,楼前有“东坡池”,相传是苏东坡读书洗砚的地方。郭沫若后来回忆道,“星期日在平坦如路的府河上划船。向青衣北岸的凌云山和乌尤山去游览,远望磅礴连绵的峨眉山,近接波涛汹涌的大渡河,在那澄清的空气中令人有追步苏东坡之感。”^①

然而,由于学校当局昏庸腐败,所谓“新学”并没有给学生什么教益,讲算术的教师连加法都弄错,所谓体操课就是教了许多日本式的舞步。那时能引起郭沫若兴趣的,倒是监学易曙辉讲授的乡土志,他常征引些历代文人的吟咏作为教材;此外便是廪生帅平均讲授的《礼记·王制》及《今文尚书》。他自称这是他后来与旧学接近的一个因数。由于学校课程“贫弱到不可思议的地步”,郭沫若那时“差不多一天到晚都在操场上玩耍”,或者钻进校内留存的原寺院的正殿和后殿去“毁坏偶像”,“不到上灯,没有上自习室的时候”。^②

郭沫若在这里读书,因为是乡下人,年纪轻,常受城里学生欺侮。第一学期,郭沫若考试成绩最优,一些学生嫉贤妒才,于是发生了撕榜风潮,并以不堪入耳的侮辱相加。先生不能制止,反而屈服,竟采用扣分、压名次、重新改榜的办法来平息风潮。风潮虽然平息了,但在郭沫若心里却播下了仇恨和反抗的种子。他后来回忆道,“这件事对于我一生

① 《我的学生时代》,《沫若文集》第7卷,1958年版,第4页。

② 《我的童年》,《沫若文集》第6卷,1958年版,第65—66页。

是第一个转扭点，我开始接触了人性的恶浊面。我恨之深，我内心的叛逆性便被培植了。”^①他在这里念了三个学期的书，便把小学生活告了一个终结。

在郭沫若领略了“人性的恶浊面”，开始形成自己的叛逆性格以后，写下了《九月九日赏菊咏怀》一首：

茱萸新插罢，归独醉餘酤。

逸性怀陶隐，狂歌和狗屠。

黄花荒径满，青眼故人殊。

高格自矜赏，何须蜂蝶谀。

诗人在这里抒发了他对陶渊明弃官退隐的清高品格的仰慕，并表示愿与古代任侠悲歌之士一起狂歌。他以高洁的菊花自誉，嘲讽了专事阿谀献媚的“蜂蝶”们，抨击了腐败不堪的教育制度。这是郭沫若表现自己反叛精神的第一首诗，在他的文学创作道路上具有重大意义。

1907年1、2月间，郭沫若把司马迁的《史记》读了一遍。他说：“那时候我很喜欢太史公的笔调，《史记》中的《项羽本纪》、《伯夷列传》、《屈原列传》、《廉颇蔺相如列传》、《信陵君列传》、《刺客列传》等等，是我最喜欢读的文章。这些古人的生活同时也引起了我不上的同情。”^②他在研读《伯夷列传》时，赞赏了司马迁关于伯夷、叔齐能够传于后世的原因的精辟分析，纠正了注疏家们过去理解上的错误。《史记》对郭沫若思想性格的形成，对他后来的史学研究和史剧

① 《我的学生时代》，《沫若文集》第7卷，1958年版，第4页。

② 《我的童年》，《沫若文集》第6卷，1958年版，第83页。

创作，都有着重大的影响。屈原、信陵君、高渐离等历史人物，是培植他的反抗精神的养料，也是他后来创作史剧的主要艺术形象的素材。应该说，《史记》不仅给予郭沫若丰富的思想营养，而且给予他丰富的文学营养。

1907年秋，郭沫若以优异的成绩，从乐山高等小学堂升入嘉定府中学堂。他在小学所受的侮辱与打击，使他的思想性格发生了变化，过去那种天真无邪的儿童精神消失了。当时他对学校仍不满意，因为校方所聘教习多为不学无术之辈，凡是新式课目，几乎都不能胜任。讲地理的先生说日本在中国的南边，博物课的先生把乌贼的嘴当成肛门，甚至讲国文的先生不懂得“望诸君”是乐毅的封号，而胡乱解为“盼望你们诸位”。这时，郭沫若课余便与同学打牌喝酒，到会馆看川剧，甚至大闹剧场。据郭沫若回忆，“吃酒的习惯是在这时养成的”。在这样的环境里，他焦躁、怀疑，在彷徨中，他开始向文学发展。“因为我们可以自修的是只有文学，有资格足以供我们领教的也只有通文学的人”。^① 课余时间，郭沫若除阅读梁启超翻译的《经国美谈》、《意大利建国三杰》，严复译的《天演论》、《群学肄言》外，开始阅读林琴南翻译的外国文学作品。他读哈葛德的《迦茵小传》，女主人公迦茵的命运，曾引起他深切的同情；司各特的《撒克逊劫后英雄略》（今通译《艾凡赫》）浓厚的浪漫主义精神，给了他很大的启示，对他后来的文学倾向有重要影响。英国兰

① 《我的童年》，《沫若文集》第6卷，1958年版，第111页。

姆(Lamb)写的《莎士比亚戏剧故事集》，过去译为《莎氏乐府本事》，林译为《英国诗人吟边燕语》，也使他“感受着无上的兴趣”。^①郭沫若把自己到乐山看到的新事物，包括外国文学作品，比作是哥伦布发现了新大陆。他后来说过，“据我自己的经验，读外国作品对于自己所发生的影响，比起本国的古典作品来要大得多。”^②不过，大量接触外国文学作品，并对郭沫若的创作产生重要影响，则是去日本留学以后的事。

1909年10月，嘉定中学学生和营防军闹事，学校当局采取高压手段进行镇压，开除八名学生，郭沫若也在被斥退之列。次年2月，他便上成都，插入成都高等学堂分设中学丙班（旧制中学第三年）。郭沫若后来回忆说：“嘉定那样的井底我是不想一刻羁留的。能够的时候是跑欧美，其次是日本，其次是京沪，更其次——这是最低的限度——便是跑成都了。这些地方发散着强有力的磁性，把我全身血液里面的铁质都吸引了去。这只是一种不可遏抑的无名的憧憬。”^③这种万里求学的宏大志愿，是他后来东渡日本寻求救国真理的重要的思想基础。然而来到成都不久，他的美好愿望便破灭了。这里同样是一些做官的教职员和骗取文凭的学生，讲经学的只拿一本《左传事纬》照本宣科，国文是一部《唐宋八大家文》，历史就等于一张历代帝王的世系表和改

① 《我的童年》，《沫若文集》第6卷，1958年版，第113—114页。

② 《如何研究诗歌与文艺》，《沫若文集》第13卷，1961年版，第133页。

③ 《反正前后》，《沫若文集》第6卷，1958年版，第159页。

元的年号表。郭沫若再次感到失望、烦恼。年轻人充沛的精力，没有用在求知上，而是在酗酒与游玩中尽情发泄。他那时“游山玩水、吃酒赋诗的名士习气愈来愈深。东门外的望江楼、薛涛井，南门外的武侯祠、浣花溪、工部草堂，是常游之地。连学校在停课试验期中，都把课本丢在一边，和一些兴趣相投的人在自修室内撞诗钟，和韵，联句，讲小说”。^① 这些正反映了郭沫若当时的苦闷心境和颓唐情绪。

然而时代毕竟不同了。时代没有让郭沫若沉沦下去。那时的成都已经弥漫着革命的空气。康有为、梁启超的保皇立宪和孙中山、黄兴的革命共和形成了分明的壁垒。虽然君主立宪派还拥有势力，但四川广大青年是鄙屑他们的。郭沫若同当时成都许多进步青年一样，接受了革命共和的思想影响，主张革命，反对改良，主张共和，反对保皇。“要把中国弄好，那就非把清廷推倒不可了”。^② 他那时崇拜邹容、徐锡麟、秋瑾、温生材，崇拜黄花岗七十二烈士，他甚至渴望着能够结识革命党人。

1911年1月，成都一些高等学堂发动国会请愿风潮，要求各校派代表参加，他被选为丙班代表去教育总会开会，参与号召全市学生罢课的斗争。学校监督为此强迫他带头复课，他断然拒绝道：“大家都为爱国运动甘愿牺牲自己的学业，我不能来做破坏运动的罪魁。”他不屈服于压力，宁愿被斥退也不当害群之马。学校当局终于把他开除了。这时恰

① 《我的学生时代》，《沫若文集》第7卷，1958年版，第7页。

② 《反正前后》，《沫若文集》第6卷，1958年版，第185页。